

《大唐西域记》古写本述略稿*

余欣

《大唐西域记》，无疑是研究中古时代中西交通史、佛教史、民族史、历史地理学以及丝绸之路考古学最重要的资料^①。成书以来，一直备受推崇，并被收入历代藏经，因而流传甚广。然而，写本时代《西域记》诸古本的综合研究，尤其是日本所藏奈良、平安、镰仓时期抄本与敦煌、吐鲁番所出残卷的综合比较研究，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②。

一、敦煌、吐鲁番本概观

敦煌文献中的《大唐西域记》，以往一直被认为是现存最古的抄本，共有6件：

1. P.2700bis, 法国国家图书馆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藏。

残片，有油污、烧损痕迹，纸质不佳，书法草率，当为归义军时代抄本。首尾皆残，首起“事见于前”，迄于“虞舜之纳”，存13行，为敬波序之一部分。背面为《僧羯磨》卷中《忏二十四覆罪法》之《藏罪法》。实际应当是《僧羯磨》抄写年代在前，后利用纸背抄写《大唐西域记》。因此，其正确的正背关系应该和现在的编目顺序恰好相反。如此，其正背面书写的内容可与S.2659相对应，而

* 本文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博物学文献所见中古时代之世界图像”、日本学术振兴会“日本所藏博物学汉籍研究”项目成果之一。

① 其记载之翔实、准确，以至于成为西方考古学者和探险家寻访古代遗址并进行发掘的指南。斯坦因就对此书称颂备至。参看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most China*, London: Macmillan, 1912, vol.2, pp.15-16.

② 虽然也有学者意识到这一领域的广阔前景，例如史睿提出日本和敦煌所保存的钞本、刻本古籍对于研治我国中古史有着重大意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等一系列的海外文献流传目录应当结合我国的古典目录加以再研究，日本所藏各种古钞本也要结合我国传世古籍、西域敦煌文书进行再校讎（《岛田翰〈汉籍善本考〉书后——兼谈日本古钞本与中国中古史研究》，《文献》2004年第2期，第206-214页）。但似乎并未在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且写本物质形态与字体亦相近,疑原为同一写卷之断片,割裂分藏两处所致^①。

2. S.2659,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藏。

正面为《摩尼教下部赞》与《僧羯磨》卷上,写本纸背抄有《大唐西域记》卷一、《往生礼赞文》、《十二光礼忏文》^②。《大唐西域记》首残尾全,首起“而寡略”,有尾题,存303行^③。卷题云“往西天求法沙门智严西传记写下一卷”。据此可知为西域求法僧智严所携写本。智严乃鄜州开元寺观音院主临坛持律大德,俗姓张氏,发愿往西天取经。同光二年(924)三月九日至沙州,驻锡龙兴寺憩歇一两月说法,巡礼圣迹^④,并撰《十二时》,留教大众^⑤。智严发下重誓,若能安然得法东归,愿将自身焚烧于五台山供养大圣文殊师利菩萨,用酬往来途护卫之恩。荣新江先生认为《西域记》和《礼赞文》、《礼忏文》抄本,是智严随身携带的实用文书,换句话说,玄奘的《西域记》是当时前往印度取经求法的僧人的旅行指南^⑥。

3. P.3814,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白麻纸,首残尾全,存180行,首起“远起宰堵波”,有尾题“大唐西域记卷第二”^⑦。《法藏目录》编者推定写本年代为9世纪^⑧。

4.S.958,大英图书馆藏。

首尾皆残,存16行,起“迦湿弥罗国”,迄“割截支体”,为《大唐西域记》卷三之一部分^⑨。

①以上描述及判断,主要根据2001年10月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原卷时所作之调查笔记。

②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176页。

③录文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辑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4-247页。

④S.5981《同光貳年三月九日智严莫高窟巡礼圣迹留后记》,录文参荣新江:《敦煌文献和绘画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方的文化交往》,《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56页;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466-467页。

⑤《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有P.2054、P.2714、P.3087、P.3286、上博48-28等抄本,录文及校注,可参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81-1669页。

⑥参看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李铮、蒋忠新主编《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6-957页。

⑦图版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6-161页;录文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辑校注》,第254-260页。

⑧Soymié, Michel ed.,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vol. IV,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91, p.303.

⑨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7页;录文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辑校注》,第261-262页;郝春文、金滢坤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39-440页。

5.81SAT:1,吐鲁番地区博物馆藏。

1981年整修吐峪沟千佛洞时出土。本件文书与81SAT:2《唐西州下宁戎、丁谷等寺帖为供车牛事》重合粘连在一起。残存10行,起“《印度记》曰”,迄“我覩”,可比定为卷七“战主国”一节^①。文字与高丽藏本完全相同,但与石山寺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橘寺本等日藏诸本有异,“《印度记》曰”,日藏本作“先贤曰”。据考,此本写于贞观二十一年(647)至永徽二年(651)期间,可能为玄奘赠与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魏智湛的礼物,约在永徽三年初由魏智湛从长安带回^②。《大唐西域记》成书于贞观二十年(646),若此年代推定不误,则成书后数年内即传入西域,为现存最古之抄本^③。

6.Ch/U 7724,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藏。

本件残片正面存汉文4行,每行3-5字不等,楷书,书写工整,背面存回鹘文10行。经刘安志比勘,所抄汉文文字系《大唐西域记》卷十《恭御阇国》,原卷每行应为17字,抄写年代很有可能是高昌回鹘时期^④。

二、日本所藏古本的调查

日本所藏《大唐西域记》古抄本,现今已知的超过十种之多,年代最早者,较之敦煌本犹古百余年,可谓弥足珍贵。较早利用古写本和早期刻本进行《大唐西域记》的文本整理校订工作的,是日本学者羽田亨和富冈谦藏^⑤。他们的成果作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丛书第一种”,于明治四十四年(1911)由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出版^⑥。这个本子以新旧高丽藏本为底本,以东寺观音院所藏北宋藏本、醍醐三宝院所藏古写本、神田香岩所藏古写本、石山寺所藏古写本以及富冈谦藏所藏旧校订本参校,并以高丽本《慈恩传》和兴福寺本《慈恩

①81SAT:1、81SAT:2,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图版,第471-472页,录文,第123-125页。

②相关研究,参柳洪亮:《〈大唐西域记〉传入西域的有关问题》,马大正等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9-306页;后收入氏著《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第372-381页。

③Liu Hongliang, “Zu einem Textfragment des *Da Tang Xiyuji* aus dem 7. Jh. und seinem historischen Hintergrund,” D. Durkin-Meisterernst, S. C. Raschmann, J. Wilkens, P. Zieme, M. Yaldiz, ed., *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4, pp. 176-179.

④刘安志:《德藏吐鲁番所出〈大唐西域记〉残卷跋》,《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杭州,2010年4月9日-13日,第420-421页。

⑤中外关于《大唐西域记》的研究或翻译论著甚多,此处仅举文本整理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⑥羽田亨校订、富冈谦藏覆校:《大唐西域记》、《考异索引》,东京:大日本图书,1911年。以下简称“明治京大本”。

传》、东大寺所藏《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高丽藏本《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为参照,还收录了知恩院所藏《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表启》中的《进西域记表》。应该说,这个整理本搜罗了各种日本古钞名刻本加以汇校,学术价值甚高。后来,季羨林先生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就是以这个本子作为底本。

不过,《西域记》诸古本本身的研究,相对来说开展得较晚,而且迄今为止仍很不充分。较早致力于研究这些写本的日本学者,大多是日文训点学专家,他们的关注点首先集中在其作为早期训点资料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上,文献学和历史学研究,很少有人涉足,但他们的研究为我们作了很好的铺垫。例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筑岛裕先生就从训点学的角度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①,并对《西域记》及《慈恩传》诸古本的所在,引用和传播的概况等,作了许多有益的提示,同时指出了其在日本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以及日本国文学诸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意义^②。近年来,文本本身的史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高田时雄先生已作了不少新的探索,揭示了其西域史和唐史研究上独特的史料价值。以下将参照两位学者的大作提供的线索^③,根据笔者目睹或知闻,就诸古本略加述考。

1. 京都兴圣寺藏延历四年(785)本

以往学界一直认为,S.2659 同光二年(924)三月智严本为现存最早的《大唐西域记》抄本,但京都兴圣寺本的发现改写了这一认识。此本十二卷全,但非同时代所写,其中卷一、卷十二年代甚早,卷一且有“延历四年七月书写 莲庆”题记^④。其余各卷均较晚,卷二、卷四有仁安二年(1167)四月题记,卷九有嘉吉二年(1442)四月题记,当系后世陆续补抄。

卷一系由卷轴改为经折装,卷背抄有解文,较其他诸卷稍长,外观特征比较特别。题记系别笔书写,似乎有疑点,但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古写经专家、赤尾荣庆先生认为根据写本外观和字体特征,没有特别的可疑之处,高田时雄先生

①关于石山寺本《大唐西域记》的汉文训读研究,参看筑岛裕:《平安時代の漢文訓読語につきて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3年,第182-215页;宇都宫睦男:《石山寺本大唐西域记长宽点の敬語》,《国语教育研究》第15号,1968年,第95-108页。

②筑岛裕:《兴福寺本大慈恩三藏法师传古点国语学研究》(研究篇、译文篇、索引篇),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1967年,尤其是译文篇的解题,第3-39页。

③高田时雄:《现存最古の大唐西域记写本》,《いとくら》(学术フロンティア“奈良平安古写经研究据点の形成”ニュースレター,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第3号,2008年1月,第10-11页;高启安中译文《京都兴圣寺现存最早的〈大唐西域记〉写本》,载《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第47-48页。

④继《いとくら》所刊卷一首尾照片之后,《古写本图录》又刊出写本原大尺寸的彩色图版,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学术フロンティア实行委员会,东京,2008年12月,第8-9页。

亦赞同此说^①。笔者无缘亲见,不敢妄断。若此题记没有问题,则为存世最早有确切纪年之《西域记》写本,也是唯一一件奈良时期写本。

此卷之存在,早在五十年代,就已为学界所知,但由于秘藏于古刹之中,外界难以一睹其庐山真面目。此后,可能是训点学研究者更为关切的是训点较多的卷十二的缘故,最古的卷一反而未作深入的探讨^②。相信今后随着高田先生的研究进一步展开,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2. 御茶之水图书馆藏长历五年(1041)本

将于第三节专门论述。

3.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康和四年(1102)本

今编号为日-甲 96,原为守屋孝藏旧藏本。原定为“国宝”,现为“重要文化财”。卷以桐函盛之,函盖题“大唐西域记卷第一”,函内题“法隆寺贯首定胤题”^③。有乌丝栏,墨色浓。卷首略有残缺,卷尾有题记“康和四年四月三日书了一校了 证印”。有木轴,旁题“信贵山执笔任教书”^④。

4.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中尊寺紺纸金银字本

奥州中尊寺旧藏,系藤原清衡在永久五年(1117)至天治三年(1126)发愿所写的金银字一切经之一部^⑤。

5. 法隆寺藏大治元年(1126)训点本

存 10 卷,卷二、卷十二阙,天头、地脚及行间有训点、四声点和假名,纸质为楮纸。卷一抄写者为静因,卷四为隆暹,卷五智严、卷六至卷十一为林幸^⑥。法

①高田时雄《现存最古的大唐西域记写本》,又,高田先生最近发表《高宗期における〈大唐西域记〉テキシトの変改について——日本古抄本による検証》,《汉译佛典研究の新时代 讲演资料集》,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学术フロンティア实行委员会,东京,2008年12月,第105-119页。由于高田先生注明“此系有必要大幅增补改订的未定稿,请勿引用”,本着尊重作者本人的意愿,对具体内容与观点不作引述和评论。

②曾田文雄:《兴盛寺本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の朱点》,《训点语と训点资料》第11辑,1959年3月,二ノ486-二ノ498页;《兴盛寺本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併解读文》,《训点语と训点资料》第14辑,1960年1月,三ノ115-三ノ146页;《兴盛寺本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併解读文“赞”以下の部》,《训点语と训点资料》第15辑,1961年1月,三ノ207-三ノ238页。

③日本习惯于书画或茶具的木函上题字,此类题记称为“极箱”或“箱书”。

④2009年1月27日,与荣新江教授、郑炳林教授、高启安教授一同前往京都国立博物馆,承蒙赤尾荣庆先生的安排,有幸在库房中拜观唐抄本《玉篇》卷九及高丽写本紺纸金银字《佛说佛名经》卷第一、第十四及此卷《西域记》,得以补充不少图录不载的信息。以上即据当时笔记节录。卷子首尾图版,见京都国立博物馆编集:《守屋孝藏氏搜集古经图录》,京都国立博物馆,图版四五,解说,第19-20页。

⑤三藏法師の道研究会编:《西域记のシルクロード 三藏法師の道》,东京:朝日新闻社,1999年,图版7,解说,第290页。

⑥卷一首尾图版及解说,见《法隆寺昭和资财帐调查完成纪念・国宝法隆寺展》,东京:小学馆,1994年,第213页。

隆寺一切经为平安时代末期最具代表性的藏经^①。保安三年(1122)法隆寺僧林幸发起一切经劝进运动,以上皆为此次大型写经活动之一部分,乃大治元年三月至六月所抄^②。卷一题记为“同年四月上旬勸愚蒙老眼移点了 僧静因”,“法隆寺一切经藏之内。此卷是五师静因结缘所书写也”;卷四题记为“大治元年二月十五日未刻书写,法隆寺一切经之料,满寺大众各为助成结缘,仍为灭罪生善,僧隆暹”,“同年(丙午)五月廿九日移点了 僧林幸”;卷五题记为“大治元年(丙午)三月廿一日于安福寺书写了,法隆寺一切经内 劝进五师林幸 笔师僧智严”;卷六题记为“大治元年(丙午)六月廿三日移点了 僧林幸”;卷七题记为“大治元年(丙午)六月十日移点了 僧林幸”,“法隆寺一切经律论内也”;卷八题记为“大治元年(丙午)六月八日写点了 僧林幸”,“法隆寺一切经内也”;卷九题记为“大治元年(丙午)六月廿八日写点了 僧林幸”;卷十题记为“大治元年(丙午)六月三日点写了 僧林幸”;卷十一题记为“大治元年(丙午)五月十五日写点了 僧林幸”^③。

6. 大谷大学藏大治元年训点本

存卷二,即前述法隆寺本所阙者。原系神田香岩、神田喜一郎旧藏。卷尾及卷背纸缝处钤有“法隆寺一切经”正方形墨印,有墨笔题记“大治元年(岁次丙午)五月十六日法隆寺一切经之内劝进五师林幸书写僧静因回向上大菩萨”,又有朱笔题记“同年六月上旬五师静因写点毕以此结缘力出离生死海云云”。此卷亦有朱点、四声点及墨书旁训、假名,天头地脚处间有音义和训校^④。静因,亦是前述法隆寺藏本卷一之写点者。由此可知,现分藏两处的大治元年本,均系静因等在僧林幸法隆寺一切经劝进之际所抄,属法隆寺藏经之残存。

7. 金刚寺藏保延五年(1139)训点本

金刚寺位于大阪府河内长野市,据说是圣武天皇敕愿创立的古寺,藏经中有不少为平安时代遗留的古写经,且存有古佚经与疑伪经,其学术价值不容忽

①关于法隆寺一切经的书写过程、写本特征,参看宫崎健司:《总说 法隆寺一切经について》,大谷大学博物馆编:《法隆寺一切经と圣德太子信仰》,京都:大谷大学博物馆,2007年,第6-11页。

②2009年4月24日,于奈良法隆寺春季特展“法隆寺秘宝展”中得见《僧林幸法隆寺一切经劝进状》及《大唐西域记》卷四。前者为保安三年(1122)僧林幸为发起法隆寺一切经劝进而陈述理由的原始材料,对于了解这一浩大的一切经抄写行动的原委,颇有价值。卷四隆暹抄写题记后之“僧林幸点移了”一行注记,可见林幸确实是倡议人和监督者。

③以上诸条题记录文,参看竹内理三编:《平安遗文·题跋编》,东京,1968年,第208-209页。

④图版见大谷大学图书馆编:《大谷大学图书馆所藏贵重书善本图录——佛书篇》,大谷大学,1998年,第64-65页;大谷大学图书馆编:《古典籍の魅力——大谷大学の名品》,京都:大谷大学博物馆,2003年,第25页;大谷大学博物馆编:《法隆寺一切经と圣德太子信仰》,第23页。

视^①。其中有一部基本完整的《大唐西域记》，存卷二至卷九，卷十一、卷十二，缺卷一和卷十。全部卷子都有训点。卷二、卷三、卷五有校记。卷四有题记“保延五年极月十六日一点之了。为兴法利生也”^②。由此推测，其他各卷抄写时间亦当相近，即大约平安后期的保延五年前后。

8. 石山寺藏长宽元年(1163)移点本

存卷一至卷八，卷九以下用刊本抄补^③。卷一至卷八为长宽元年所写，形制大同小异。以卷一为例，有长宽元年朱点(假名、ヲコト点、东大寺三论宗点)、长宽元年前后墨点(假名、声点)、南北朝后期墨点(假名)，卷尾有朱笔题记“长宽元年八月十六日移点了”。卷九、卷十为室町时代宝德元年抄补，有宝德元年墨点(假名)，卷尾有释音。卷九末有题记“宝德元年十二月二日(别笔追写)一校了 能贤书之”，卷十题记为“宝德改元己巳黄钟日 释氏守洪谨书”，“右经者石山寺大藏经也(后有发愿文，略)”。卷十一、十二形制同卷九，无题记，当为室町时代中期补写。

9. 名古屋七寺藏治承二年(1178)本

存卷一至卷三，卷五至卷八。属于“七寺一切经”之一部分。

以上9种，除个别部分有补抄外，均为平安时代后期写本。

10.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橘寺训点本

松本文三郎旧藏^④，十二卷全，无确切年代，推定为镰仓早期写本。今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松本文库所藏。册子本，每卷为一册，封面题“大唐西域记卷第x”，“持宝院长弘”。每册标题之下钤有“橘寺”墨印，卷末有“东大寺持宝院经藏之本也”云云之类的题记^⑤。又有别纸签条写“《西域传》一部，十二帖，东大寺持宝院经藏本也。永禄二年己未卯月吉日大法师长弘”。每页七行，行十九至二十八字不等，旁注墨书假名训点甚多，似为众本之冠。卷中所述诸国，施以朱笔为段落标志。按，橘寺，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之天台宗寺院。东大寺，则是举世闻名的华严宗寺院，位于奈良市杂司町，持宝院为其子院之一。永禄二年为1559年。据此可知，此本原属橘寺藏经，后归东大寺所有。

①落合俊典编：《金刚寺一切经的基础的研究と新出仏典の研究》，平成12年度—平成15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A)(1))研究成果报告书，东京，2004年。

②落合俊典编：《金刚寺一切经的总合的研究と金刚寺圣教的基础的研究：研究成果报告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平成15-18年度)，东京，2007年，第406页。

③参看石山寺文化财综合调查团编：《石山寺の研究·一切经篇》，京都：法藏馆，1978年，第750-752页。

④松本文三郎先生对玄奘推崇备至，曾撰有《玄奘の研究》，氏著《东洋文化の研究》收录为首篇，东京：岩波书店，1926年，第3-74页。

⑤卷一题记于此句后有“不可他出之也”。

同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之东大寺持宝院·橘寺旧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封面题“从承元四年至文化十三年五百九十六年”，当为文化十三年补题，卷尾题“承元四年卯月十五日书写并移点毕 同年六月十三日一校了”，“贞应六年之长讲会讲师弁渊得乘西域传慈恩传共证也”。梶浦晋认为，《西域记》与《慈恩传》的书风相似，因此，《西域记》的抄写年代也可据上述《慈恩传》题记推定为承元四年（1210）前后^①。据笔者目验，装帧、纸质、字体、钤印以及题记等，两者的确非常近似，梶浦先生的判断应当无误。

11. 醍醐三宝院藏建保二年（1214）本

存卷十一、卷十二，亦属镰仓早期写本^②。日本国语史学大家筑岛裕将其全部影印，并将原文和训点以上下段对照的形式作了转写^③。两卷纸质皆为白楮纸，均有乌丝栏。卷十一，共 19 纸，纸长 54.5m，高 27.6cm，天头地脚各约 2.0cm，一纸 27 行，每行约 19 字。首题、尾题俱存，题记云“建保二年九月廿三日书写了”。卷十二，共 23 纸，纸长 52.4m，高 27.6cm，天头地脚各约 2.0cm，一纸 25 行，每行约 19 字。首题、尾题全，题记云“建保二年十一月晦日书了 深贤”，“交了”，又朱笔“借请彼山座主僧都书点也”，“此书本石山寺经藏本也，文字并点谬在之欵，追可交了”。据此可知系以石山寺本为底本抄校。不过，如前所述，石山寺藏长宽元年（1163）移点本之卷十一、十二乃室町时期补抄，因此不能确定醍醐寺本是否抄自此部石山寺藏经。

三、成篁堂旧藏本的初步考察

御茶之水图书馆（お茶の水図書館），是日本唯一的一家女性杂志专门图书馆，属于财团法人石川文化事业财团所有，是《主妇の友》创刊人石川武美于 1947 年所设立，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④。由于收购了德富苏峰的成篁堂旧藏和佐佐木信纲的竹柏园本，因而在“专门图书馆部门”之外，还设有“古典籍·古文书部门”，藏有大量汉籍善本与日本“国文学”资料。《西域记》写本就是原成篁堂旧藏秘笈。先简要著录如下：

① 参看梶浦晋：《人文研のアーカイブス》（1）《大唐西域记十二卷 唐释玄奘奉敕译 唐释辩机撰》，《汉字と情報》NO.1，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汉字情报研究センター，2000 年，第 7 页。承蒙梶浦晋先生当面指教，并提示相关资料，谨致谢意。

② 卷子首尾照片见东京国立博物館、总本山醍醐寺、日本经济新闻社编：《国宝醍醐寺展：山からおりた本尊》，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2001 年，图版 56，第 111 页。

③ 筑岛裕：《醍醐寺宝藏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一建保点》，《研究纪要》第 11 号，1991 年，第 1-52 页；《醍醐寺宝藏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二建保点》，《研究纪要》第 12 号，1992 年，第 1-65 页。

④ 御茶之水图书馆主页 <http://www.ochato.or.jp/>。

故此标建。岁久弥神,祈愿或遂”此节文字中,诸本皆作“基址尚在”,独御茶之水本作“基趾尚存”;“无忧王弟大帝所建也”,诸本皆无“也”字,惟御茶之水本见存;“祈愿成遂”,《释迦方志》本、高丽藏本作“祈愿”,御茶之水本及其他诸本皆作“所愿”;“或遂”,明洪武刊《南藏》本作“咸遂”,御茶之水本及其诸本皆作“或遂”。其校勘上的价值,限于篇幅,不能详细展开。

此本亦为最早之日文训点本《西域记》。正文汉字旁以小字注有大量片假名符号,显示出平安初期以降使用片假名训点文本的典型特征。例如第二行“淳质”,“淳”字旁注“トノ”,“质”旁注“之ツナリ”^①,先用同音汉字注音,是汉文古籍固有的常用方法,再注日文训读,兼表语汇、语法、训法上的特质,则是日本的发明,两者并存,非常有意思。再如第三至第四行“以大都城持施众僧,于此城中建二伽蓝,各减千僧。并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其中“城”字注“シ”,“持”字旁注“チ”,“蓝”字旁注“ソ”,“减”字旁注“せり”,“学”字旁注“マナフ”,二“僧”字、“中”字旁注“ニ”,既有音读,又有训读,还有表句读。所注读音,与稍后的石山寺本《西域记》颇有异同^②,与今天日语的汉字读法更是相距甚远。因此,这些注记,堪称研究平安时代日本汉文训读学之绝佳材料,亦是研究中古汉语音韵学的重要参考资料。若能与平安时期佛经注疏、论释,《文选》、《白氏文集》、《蒙求》等汉籍的汉文训读,《日本书纪》等史籍,及《源氏物语》等假名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很有前景的课题。

苏峰尝撰多篇读书随笔,偶尔会提到得书之经过。《大唐西域记》及《法显传》,他也会撰文,云《法显传》乃称名寺逸出之金泽文库本,为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偶然在东京曲町书肆中发现,但《大唐西域记》的来路却未提及^③。卷中所贴德富苏峰所书笺条,使我们得以了解他获得此书的时间、途径、书价等详情,不仅补充了一些信息,也是饶有兴味的学术史材料。文中大谷师,当指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大谷探险队发起人大谷光瑞,二乐庄乃其神户郊外别邸^④。德富苏峰与大谷光瑞交情匪浅,在学问的世界视野和明治时代的立国精神等重大问题上,两人均持有相近的见解,是相知颇深的友人^⑤。竹苞楼,即佐佐木竹苞楼,是京都有名的古书肆,创业于宽延元年,至今犹存,已有二百余年历史^⑥。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由羽田亨经手分批购入,就是由佐佐木

①“淳质”,在石山寺本中,训读为“スナホナリ”。

②筑岛裕:《石山寺经藏の训点本について》,《石山寺の研究·一切经篇》,第920-961页。

③德富苏峰:《〈法显传〉とく西域记》,氏著《读书法》,东京:讲谈社,1981年,第122-128页。

④关于二乐庄与大谷探险队,以下两册特展图录披露了不少新材料:《モグニズム再考:二乐庄与大谷探险队》,芦屋市立美术博物馆,1999年;《モグニズム再考:二乐庄与大谷探险队Ⅱ》,芦屋市立美术博物馆,2003年。

⑤参看上山大峻:《大谷光瑞师とシルクロード佛教遗迹调查》,《丝绸之路の至宝 西本愿寺 佛教传播の道 踏査100年展》,守山市:佐川美术馆,2002年,第7、11页。

⑥书店简介可见《改订版京都古书店巡り》,京都府古书籍商业协同组合,2000年,第21页。

之斡旋,达成交易的^①。由此我们不难得知,正是因为德富苏峰与大谷光瑞及佐佐木均熟络,故而因缘际会获此善本。

四、关于《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

与《大唐西域记》密切相关的《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中国早已亡佚,惟日本存之,也很值得重视。所存古本有二:

其一为知恩院藏本,系平安时代古钞本。除《进西域记表》外,还收录了其他表启制敕,篇目如下:《进经论等表》、《请太宗文皇帝作经序并题经表》、《太宗文皇帝报请作经序敕书》、《谢太宗文皇帝敕书表》、《谢纳袈裟剃刀表》、《谢太宗文皇帝制三藏圣教序表》、《太宗文皇帝报玄奘法师谢表敕书》、《谢述圣记启》、《皇帝在春宫日报玄奘法师谢启书》、《太宗文皇帝与长命婆罗门书》、《玄奘师玄法师请经流行表》、《玄奘法师谢东宫书述圣记启》、《请经出流行启》、《皇帝在春宫日所写六门陀罗尼经及题菩萨藏经等谢启》、《玄奘法师请附讯物及书往西域表》。以上共计16首表启制敕,篇末注明年月,文字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收多有出入,其史料价值之高,不言自明。明治四十三年(1910),内藤湖南曾将此秘笈影印,并附有跋文,述其价值,颇为精到,其文略云“近取以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异文殊多,又有传所阙而此独存者数首。……若能摭丽藻于逸篇,补前修之缺简,虽片纸断缣,比如拱璧矣。”^②笔者在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见到内藤湖南自存本,钤有“湖南秘笈”藏书印,并附有“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拓本一通及附笈一枚。此本,罗振玉复以珂罗版影印收入《吉石龕丛书》^③,然鲜见学界徵引。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系转录自1923年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等校本及吕澂重校订本^④。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仅附录《进〈西域记〉表》,则是从“明治京大本”转载^⑤。《表启》又有贵重古典籍刊行会所印行之原大影印本,并附写真三枚^⑥,似未见国内学者提及,盖印数甚少,流通不广之故。

另一古本,即小泉策太郎旧藏本。原卷据说今存日本某私人收藏者之手,难睹真颜。但小泉氏曾将此卷制作成复制本,分赠友好。不过,复制本亦仅有百卷,战后恐存世无多,今已颇为难得。高田时雄先生藏有一卷,以暗红漆木函盛

①高田时雄:《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②内藤湖南:《宝左龕文》,大正十二年(1923)刊于平安,叶四十四;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东京:筑摩书房,1997年,第26-27页。

③罗振玉:《吉石龕丛书》,上虞罗氏刊印,1914-1916年。

④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第234-241页。

⑤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1053-1054页。

⑥《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知恩院藏》,东京:贵重古典籍刊行会,1960年。

之,函盖题“寺沙门玄奘上表记 柯荫精舍藏”,编号为第53。后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亦查到一卷,编号为第5,余与高田藏本同。笔者寻觅经年,终于购得一卷,且与他卷有所不同。引首以金色卷草纹锦绫装裱,蓝色锦带象牙书签,皆为高田藏本和人文研藏本所无,引首内里上方墨笔题“复制百卷之内第一卷”,下方钤“柯荫精舍丛书”阳文篆字朱印,卷首纸缝下方钤“汲古”阴文篆书朱印、“泉三申”阳文篆书朱印,后二方印亦为他本所无。按,“柯荫精舍”乃小泉策太郎书斋之雅号。小泉策太郎(1872-1937),号三申,明治昭和之际著名政治家、传记作家^①。本卷编号为百卷之首,乃装潢异于普通复制本之特制本,且钤有小泉私印,以理揆之,当是小泉自存之本,不知因何流落书肆。

复制本无制作年代。然小泉氏好搜集文物古籍,曾将自己所搜集的佛像等文物编辑出版图录《柯荫精舍真鉴》^②。据小泉自撰《坐渔庄日记》,大正十五年十一月七日午后拜访西园寺公望^③,其中特别提及,因西园寺氏为《柯荫精舍真鉴》题字而致谢,同时呈上一卷《玉华寺沙门玄奘上表记》复制本^④。由此不难推测,复制时间约在大正十五年十一月稍前。

小泉本前三分之一与知恩院本大体相同,但缺首篇《进经论等表》,后半部分《玄奘法师请附讯物及书往西域表》之后较之知恩院本多出廿七首,篇目依次为《进经表》、《请取梵本表》、《皇帝与玄奘法师飞白书十八字》、《谢得一切经表》、《许制大慈恩寺碑文及得宰相助译经表》、《谢得大慈恩寺碑文表》、《请书大慈恩寺碑文表》、《谢许书大慈恩寺碑文表》、《谢送大慈恩寺碑文并设九部乐表》、《请得善洛法师等重出家表》、《谢得医表》、《谢得医药及敕使问病表》、《谢僧尼等停依俗法条表》、《重谢僧尼等停依俗法条表》、《谢施纳并杂物表》、《庆佛光王周王日表》(《大正藏》本“日”误作“曰”)、《庆佛光周王三日并进衣钵锡杖表》、《谢为佛光周王满月剃发并庆度人表》、《庆佛光周王满月并进法服等表》、《请入嵩岳表》、《皇帝报玄奘法师请入嵩岳表敕书》、《谢敕书表》、《法师玄奘重请入山表》、《谢得入山表》、《请御制大般若经序表》。其中二种古抄本均有《太宗文皇帝与长年婆罗门书》,内藤湖南跋云“疑係孱人”。神田喜一郎则以为必有缘由。高田时雄先生肯定了神田的推测,进一步论证了玄奘与长年婆罗门的密切关联,并指出玄奘在太宗时期承担了唐与印度外交顾问的角色,为文献结构提供了合理的新解释,同时也为深

①小泉氏的生平,参看长谷川义记著:《评传小泉三申:知性と运命の相剋者》,东京:岛津书房,1977年。

②《柯荫精舍真鉴》,东京:柯荫精舍,大正十五年(1926)初版,增补版,昭和十年(1935)。

③西园寺公望(1849-1940),亦为日本著名政治家,二十世纪初曾两度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策太郎与西园寺公望交情颇深,西园寺公望之传记,即为小泉所撰。

④小泉策太郎:《小泉三申全集》第三卷《随笔西园寺公》,东京:岩波书店,1939年,第363-364页。

人研究表启做了一个出色的示例^①。

其实,表启内容《大正藏》卷五二《史传部》已收录^②。《大正藏》本以小泉本为底本,所阙《进经论等表》取知恩院本补足,并写有校记^③。但毕竟是转录排印本,并非原貌。若能将知恩院本、小泉本以及《慈恩传》汇集在一起,作成一影印精校全本,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欣闻高田先生有意将其重新影印并整理出版,当翘首以盼。

五、《大唐西域记》及相关古本综合整理与研究刍议

大正元年(1912),堀谦德著《解说西域记》出版。此书同样以高丽本为底本,宋元明诸本为参酌,并参考了不久前面世的明治京大本^④。校录本文之外,加以详细解释和考证,并附有近60页的研究资料目录、81页各类索引以及地图,是“日本最大规模的《西域记》整理著作”^⑤,可谓堪与京大本并肩鼎立之双璧。

八十馀年后,又一批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学者,汇聚在桑山正进、高田时雄主持的共同研究班,作成《大唐西域记》的一字索引。作为编写索引的基础工作,他们对本文进行了校订。这一校订工作,是以“明治京大本”为底本,参照诸本对明显的错误作了订正,同时还参考吸收了此前出版的季羨林等校注本的研究新成果^⑥。

中国方面,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向达先生就将《大唐西域记》列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计划,并酝酿出版“超过所有外国的译本”的更加完善的整理本,提出影印本、简注本和详注本三步计划的工作思路^⑦。发

①高田时雄:《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に关する一问题——玄奘と长年婆罗门》,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学术フロンティア实行委员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1世纪COE实行委员会編集:《佛教文献と文学》,东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学术フロンティア实行委员会,2008年,第219-230页。

②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卷,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7年,第818-826页。

③但校记称小泉本为唐时代写,知恩院本为奈良时代写,恐未必,两者应当都是平安时期抄本。

④堀谦德:《解说西域记》,东京:国书刊行会,大正元年(1912)初版,昭和四十六年(1971)年复刻版。

⑤2008年5月16日,笔者赴东京出席东方学会主办的“第53回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有幸拜会池田温先生,谈及此书时,池田先生有此评语。

⑥桑山正进、高田时雄编:《西域行记索引丛刊》I《大唐西域记》,京都:松香堂,1999年,本文附于索引后,其底本及校订说明见凡例。

⑦谢方:《二十六年间——记〈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出版兼怀向达先生》,原载《书品》第1期,收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守正出新: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8年,第41-49页。

表相关论文^①,并将国内的三种古本(敦煌本、福州藏本、赵城金藏本)的影印本稿子交给中华书局^②。可惜由于政治原因,一直拖到文革结束后的1981年才问世^③。八十年代初,在季羨林先生主持下,展开《大唐西域记》的校注工作。参加校注的有杨廷福、张广达、耿世民、朱杰勤、张毅、蒋忠新、谢方、王邦维等,均为术有专攻的著名学者^④,可谓极一时之选。因此,出版后即成为最为通行的本子。对于唐史、佛教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贡献。但是因为《大唐西域记》所涉问题至广至难,白璧微瑕,在所难免^⑤。据说,季羨林先生自己也对校注本不甚满意,希望能出一个修订版,可惜一直未能实现^⑥。

在我看来,其中一个主要的不足之处,就是校注本以前述“明治京大本”为底本,对于各种日藏古本,虽知“中多秘籍”,却限于条件,除了《四部丛刊》影印配补宋本缺卷的灵瑞山酬恩庵抄本和《大正藏》所附中尊寺本外,只是据日本学者的《考异》转引,而未能据原本汇校^⑦。

《大唐西域记》诸古本未有影印集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西域求法高僧传记之日藏古本汇集影印本,主要有两种:其一为《法显传译注解》^⑧,第一、二部为译注篇和解说篇,第三部为资料篇,影印了东禅寺藏北宋本、增上寺藏南宋思溪藏本、增上寺藏高丽大藏经本、天理图书馆藏石山寺本、宫内厅图书寮藏北宋本,共计五种《法显传》版本。虽然前面的译注和解说并不无小误,但收录多种稀见古本,资料价值非常高。其二为《西域求法高僧传集》^⑨,影印

①向达:《记现存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文物》1962年第1期,第31-36页;觉明:《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现代佛学》1964年第6期,第19-27页。

②除此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古本,即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原北平图书馆藏思溪藏本,仅存卷九。此本与《四部丛刊》所收影印本之底本同版。参看阿部隆一:《增订中国访书志》,东京:汲古书院,1983年,第327页。不知是移藏台湾不便借影之故,或是出于其他考虑,向达先生所辑国内古本《大唐西域记》未包含此本。

③玄奘撰、辩机编,向达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1981年。

④据季羨林《说明》所列,见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39-141页。

⑤目前所见有关的商榷意见,主要是个别字词的校注问题,未及根本。例如姚永铭:《〈大唐西域记校注〉商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6期,第25-27页;哈磊:《〈大唐西域记校注〉疏误数则》,《学术研究》2004年第2期,第139-140页。

⑥荣新江教授为纪念季羨林先生所写的《哭季先生》(香港《明报》2009年7月15日),也谈及此点。

⑦范祥雍:《校勘例言》,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45-146页。

⑧长泽和俊:《法显传译注解:北宋本·南宋本·高丽大藏经本·石山寺本四种影印とその比较研究》,东京:雄山阁,1996年。

⑨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编集委员会编集:《西域求法高僧传集》,东京:八木书店,1980年。

了天理图书馆所藏长宽二年(1164)《法显传》^①、镰仓时代初期钞本《法显传》、平安时代后期钞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奈良时代末期《南海寄归内法传》、长宽二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亦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日本的公私机构中汉籍的收藏极为丰富,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寺院,往往多有珍本秘籍。近年来,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落合俊典教授主持的“七寺古佚经典研究”^②、“金刚寺一切经研究”,以及“奈良平安古写经研究据点的形成”项目所从事的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等事业^③,都表明寺院古佚经典的调查与研究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西域记》初传日本,系鉴真和尚携来,据正仓院文书记载,最早的抄本写于天平十一年(739)^④,而书志中最早著录《西域记》者,为大约成书于宽平三年(891)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⑤。至平安、镰仓时代已非常流行,在佛经注疏、类书、辞书和博物学文献中经常可以见到大量的徵引片断,甚至还有为了向民众宣讲而编写的类似于敦煌变文、讲经文一类的唱导本的存在^⑥,因此,发现更多的《西域记》古钞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若有学术机构愿意将上述《西域记》写本及将来新发现者加以整合,附以《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诸古本^⑦,仿前述《法显传》、《西域求法高僧传集》之例,勒为一编,影印公刊,为日后重新董理《西域记》提供坚实的文本基础,诚为嘉惠学林、功德无量之举。是所望也。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①即长泽和俊《法显传 译注 解说》资料篇所收石山寺本,卷尾有“长宽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于劝修寺东院书写了,奉为先师圣灵,殊致丹心染紫毫。信宝”题记,卷首钤有“石山寺一切经”墨印。下文所提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末有“长宽二年九月四日辰时书写了,一交了”,卷上标题下亦钤有“石山寺一切经”墨印。可见二者为同时期写本,原均属石山寺藏经之一部。

②落合俊典编:《七寺古佚经典丛书》第1-3卷《中国撰述经典》、第4卷《中国日本撰述经典·汉译佛典》、第5卷《中国日本撰述经典·撰述书》、第6卷《中国日本经典章疏目录》,东京:大东出版社,1994-2000年。

③《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第一辑《玄应撰 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第二辑《大乘起信论》、第三辑《长宽三年写观无量寿经·保延四年写无量寿经论注卷下》,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学术フロンティア实行委员会,东京,2006-2008年。

④石田茂作:《写经より見たる奈良朝佛教の研究》,东京:东洋文库,1930年,第32-36页,附录《奈良朝现在一切经疏目录》,第145页。

⑤矢岛玄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集证と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4年,第113页。

⑥著名的金泽文库残存的古籍,现归属神奈川县立金泽文库保管运营。不仅汉籍值得注意,大量与佛教有关的日本典籍、文书,也是研究中古东亚社会的重要资料。其中有镰仓时期的《西域记传抄》,尤为引人注目。此书之相关简介,参看《よみがえる鎌倉の学问》,横滨市:神奈川县立金泽文库,2006年,第60页。

⑦日本所存《慈恩传》之古抄本犹多于《西域记》,也很值得整理与研究。关于此问题,笔者拟另文讨论。